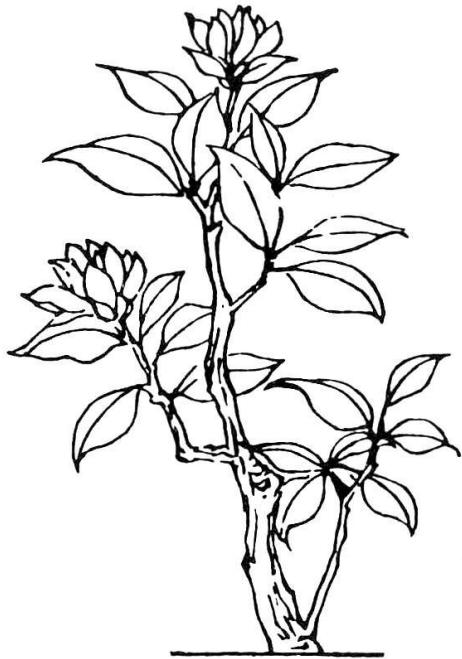


利瑪竇來華的 歐洲史背景

陸鴻基



一五八二年秋，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抵達澳門，次年，利氏等傳教士移居當時的廣東省會肇慶。利氏來華，是中國近代教會史的開端，也是中西交通史上劃時代的大事。這件大事，不是發生在一個真空管子裏，而是發生在具體的時空、在確實的歷史背景之中。因此，要公正合理地估量這時期的傳教活動和中西文化交流，就必須對十六、七世紀的中國、西歐、和中西交通傳教活動的宗教、政治和文化背景，先作一點檢討。

葡萄牙與西班牙的海上擴張

要談十六、七世紀的東西交通，就得從葡萄牙、西班牙兩國的海上擴張說起。原來今天的葡、西兩國，中古時代早被信仰伊斯蘭的阿拉伯人征服了。半島的中古歷史，很大部份就是葡萄牙、西班牙的基督徒騎士要擺脫外族、外教人統治的鬥爭故事。經過幾百年的鬥爭，騎士的勢力慢慢結集成爲葡萄

牙王國和西班牙聯合王國。同時，騎士們也養成了一種習尚，就是仇視伊斯蘭以至一切外教事物、輕視外教人、慣常用武力和強硬的手段解決宗教差異、及以征戰爲取得財富之方法。到了十五世紀末年，葡、西兩國的「復國大業」總算在半島上完成了，但騎士的「十字軍」習尚，一時間難以改變過來。兩國遂迅速地走上海外擴展的道路。

葡萄牙「復國」較早；在亨利親王領導之下，已開始向葡萄牙以西的大西洋島嶼、和以南的非洲海岸，進行探索。探索的目標，一方面是尋找更多的土地，讓葡王手下的「十字軍」去征服和分封。另方面，也是要繞到地中海南岸和東岸的伊斯蘭帝國的背後，作軍事干擾；又希望能藉此打通與中國的貿易。這是個野心勃勃的計謀，但却缺乏了地理知識。原來，那時的歐洲人不知道非洲到底有多大，又誤以爲非洲與埃塞俄比亞與印度是同一處地方，而這處地方就是傳說裏

的國富兵強的「約翰神父」的帝國。葡人相信，如果繞過非洲，跟「約翰神父」取得聯繫，就可以前後來攻信奉伊斯蘭的土耳其帝國，瓜分其土地，迫使其人民改信基督教，及奪取其經手的中國與西方的貿易。結果，幾經艱苦，繞過了好望角，到了非洲東岸，葡人才知道非洲比較歐洲更大、印度在非洲以東、「約翰神父」國根本不存在、埃塞俄比亞雖是信仰基督教，但却貧弱不堪，也無意聯繫葡滅土。葡人的戰略大計證實行不通了；但他們的軍事干擾和奪取貿易的野心沒有消滅。遂利用他們的堅船利砲，和在非洲沿岸建立的基地，接連肆意破壞印度洋海岸回教商船的貿易；並不斷沿印度洋向東推展，建立基地，與伊斯蘭各國為敵。在他們心目中，這是一場揉合著宗教和經濟動機的「十字軍東征」；但在伊斯蘭國家的眼中，這些「佛朗機」（回教人呼西歐人為「佛朗機」）是海盜和侵略者。終於，在 1517 年，葡萄牙人到了廣州；但「佛朗機」的臭名，已早由印度和東南亞商人的口中，傳到了中國。此後數十年，佛朗機多次嘗試在廣東沿岸繼續他們在印度和東南亞的行徑，都沒有成功。明政府因為防禦倭寇，對海上來的武裝怪客，戒心也特強。結果，葡人還是比較和平地在澳門定居下來，完成了從里斯本經過非洲、臥亞、麻六甲、到中國和日本的一系列帝國主義根據地。葡王也向教宗取得這東路上的「保教權」。

西班牙「復國」和建成聯合王國較晚，但也致力擴張領土和尋求路徑繞過伊斯蘭勢力的背後，去跟馬哥勒羅筆下富庶無比的中國通商。南下非洲海岸的航路既已為葡人捷足先登，西班牙王遂資助哥倫布向西尋找到東方的航路。西班牙人對「異教」和「異端」

比葡人更不容忍；不容許新教友有絲毫不依從西班牙人崇拜的習慣。資助哥倫布的款項便是把已經皈依公教的猶太人抄家而得來的。哥倫布無意之間發現了「新大陸」；西班牙王白手執着一個大帝國，也向教宗取得這西路上的保教權。後來，西班牙人征服了整個中南美洲，迫使印第安人領洗入教；又在美洲設立「異端裁判所」，嚴令印第安教友放棄傳統文化。這個血腥手段雖然沒有完全收效，但西班牙帝國的臣民都算得上是基督徒了。西班牙人又以墨西哥為根據地，征服了菲律賓群島，在那裏建立了美洲式的帝國統治。這裏的西班牙人自始便與福建通商，又派遣傳教士到台灣向當地的華人和山地人傳教。於是西、葡兩國都在中國邊緣建立了通商和傳教的根據地。他們傳教的方法，通常都是以唯我獨尊、絕不容忍本地文化傳統的態度，公開貶斥本地宗教和習俗，以宣揚西葡半島形式的基督教。這樣的傳教方法，在兩國的殖民地裏，配合着政治和軍事勢力，還算有點效果；入教的人，規定要忘宗滅祖，棄絕舊我，改用葡萄牙和西班牙姓名。但在殖民地以外，傳教效果則極為有限；傳教士羞憤之下，往往主張使用武力；例如好些十六世紀教士相信，只要葡王或西王肯撥出三五百名騎士，就可以征服整個中國，廣為施洗了。

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

葡萄牙人初抵廣州那一年，馬丁路德修士在歐洲公開提出了他對教會「正統」神學的挑戰，遂把十五、六世紀的教會改革運動帶進了全新的階段。從此，拉丁教會四分五裂。羅馬公教會和新興的教會在嗣後百多年的文鬥和武鬥中，不斷把各自的信條寫得愈

來愈堅定，也就是界說得愈來愈斬釘截鐵和愈缺乏彈性。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，望德與愛德和互相容忍每見縮減，而對信條的看重，則年有增加。每個教會對自己的信徒的信仰的「純潔」、崇拜禮儀的規範、及教士訓練和生活的限制，也有着越趨嚴格和硬性的要求，對「異端」的產生也採取更為敵視和嚴峻的態度和措施。

在此形勢刺激之下，公教會內部有兩項重大的行動，與本文主題有着密切關係。一是舊修會的改革與新修會的成立；二是脫利騰大公會議的召開和議決的落實。在十六世紀中後期，很多舊有的修會，如道明會、方濟各會、奧斯定會等，都進行過相當有效的內部改革；而新的修會，如耶穌會等，也在此時期成立，以改革教會、服膺教宗為立會原則。這些修會都本着厲行公教會訓導的熱忱，嚴格地培育修士，一方面要在歐洲各地收復公教會的損失，另方面也要到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發現的新土地去，傳揚基督的宗教。這些修會之中，以耶穌會最為引人注目。該會以較為近代化之會章和教學方法為基礎，很快就吸引了歐洲各國社會上許多精英少年到會辦的學校唸書；學生之中志願進會的，又要經過十分嚴格的挑選和訓練。因此，耶穌會的修士，往往是當時歐洲社會的上選人才，博古通今，學問很有基礎。而修會又能夠很有彈性地把他們派到各種重要的工作崗位上去。耶穌會學校的畢業生，也因為家境和教育的優越，在政治和學術方面往往佔了高位。這樣，耶穌會對公教改革運動的推行，產生了很大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效用；難免就跟其他的修會有所爭競和磨擦——有時甚至是互相攻訐。這種公教會內部的明爭暗鬥，乃後來各修會因為在中國傳教的方

針不同而爆發的「禮儀之爭」的背景和伏線；也導致十八世紀後期歐洲各國和教廷解散耶穌會。（耶穌會在十九世紀初獲准復會。）

脫利騰大公會議是中古教會的公會議運動的最後成果，也是羅馬公教經過數十年新教改革的衝擊、振奮圖強的最高層表現。大會的議決，加強了教宗的權力，使得教會的組織更像當時歐洲政壇上的君主集權制。又鞏固了教會統制對神職人員的訓練和生活、教民的信仰和禮儀、等等方面管制。如此，羅馬公教會總算是在歐洲的東部和南部整頓和穩定下來，較有實力到新航路各地傳教；但脫利騰議決的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，也障礙了向外傳揚的基督教與各地固有文化的互相融彙。



十五到十七世紀的西歐，除了宗教改革以後，也經歷了所謂「文藝復興」。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，以為這時期是中古思想和學術的沒落，和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和藝術的復興；他們以為這代表了黑暗的過去，光明的重現。幾十年來，史學家漸漸提出反對的論調，以為這時期是中古和現代的交替和過渡

時期。他們指出這時期的思想和學術的中古淵源仍然很深，現代思想只有零星的幾點萌芽；要經過百多年的默默培植，到了十七世紀末年，才得以成為氣氛。就以天文學為例，中古奉行的亞里士多德派的「地心說」，久未能夠算出準確的曆法，早以為教廷所詬病。1543年，哥白尼提出「日心說」的計算辦法，在曆法上並不比舊法準確，也不為天文學界所接受。嗣後一個多世紀裏，新的和改良舊的辦法競相出現，但還是以第谷使用「地心說」計算的日曆最為準確。最後，牛頓的力學（1687年）集合了伽利略和刻卜勒等人研究的大成，為「日心說」提出了完整的宇宙觀，才把新的曆法計算鞏固過來。天文學以外，很多方面的學術和思想的發展，也是經過漫長的過渡時期。古希臘羅馬的文學和藝術的局部復興，并未會改變歐洲思想的面貌，而只是一個漫長複雜的過程的一部份而已。十六、七世紀西歐知識份子的思想，仍是以基督教化的亞里士多德思想為主體，夾雜着一些柏拉圖思想，和幾點萌芽的疑竇。這不獨在公教國家如是，在新教國家也如是；開日後現代思想先河的先知先覺之士也都如是。因此，十六世紀後期，耶穌會在葡萄牙科因布拉大學傾力整理中古學術、編寫成一系列的亞里士多德·多瑪斯派教科書，行銷當時公教和新教各國的大學，成為最受歡迎的課本。這些課本，往往就是來華耶穌會士的學術基礎，也是他們在中國介紹西方學問的根據。這套中古學問，在今天回顧起來，是經院時代的強弩之末；但在當時却是學術界大多數人眼裏的中興碩果。

晚明政治與思想

明萬曆十年，利瑪竇等耶穌會傳教士從

飽經宗教改革和王朝爭霸戰的歐洲來到中國。晚明的中國，無論在經濟、技術、衛生、文藝等方面，都不比同時代的歐洲遜色；在社會平安和政治穩定方面，則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當然，在某些事情上中國比較進步，在某些事情上却比較落後；但總括來說，中國跟當時的西歐，可說是平等而略勝一籌的。因此，耶穌會的飽學之士在中國經過長期的居留、觀察、研究，對中國大體上是由衷的仰慕；他們認為中國只有一樣事情遠不如西方的，就是宗教。所以，他們既堅持傳揚基督教，但却沒有澳門和菲律賓的傳教士的傲慢和氣燄，更沒有十九世紀炮艇傳教士常有的恃勢凌人。在華耶穌會士寫回歐洲的書信，對他們在中國所見所聞，更時有推許。

但從晚明士大夫的角度看來，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中葉的數十年，倒不是中國歷史上光輝的時代。明朝自十六世紀初以降，皇帝一代比一代更耽於逸樂，有十數年不上朝的。皇權往往旁落於宦官手上，以致朝政腐敗，對忠諫或異己的士大夫使用廷杖和秘密警察的私刑。士大夫更分成黨派，在朝廷上因為大大小小的問題，互相攻訐。國家的財政，因為宮廷的奢侈消費和禦倭戰爭的消耗，而致拮據不堪；萬曆皇帝苛徵重稅，和信任宦官充當「鑛使」到民間搜括的措施，更使貧富的人民對政府怨憤。同時，東北塞外滿洲的崛起，更增加了關心國事的士大夫的憂慮。在此景況之下，正直的知識份子有什麼精神上的支撐呢？

明代讀書人理論上都是儒家；他們為了應試而苦讀的是宋儒朱熹對四書五經的註疏。但真心服膺於這種「正統」思想的人不一定很多。不過，到了十七世紀初年，也漸漸有人回到朱子的學說去尋求答案。明代最重

要的儒學思想家是王守仁；他在十六世紀初年離開了朱熹的學派，提出了「致良知」的「心學」。此後百多年裏，有不少知識份子從王學得到做人的指標；但也有很多人唱着王學的口號，以支持縱情不羈的生活。佛家和道家的思想，在晚明都有所復興，也吸引了相當的人。也有人提倡儒釋道三教合一的；「三教」也有傾向於平民化、宣揚簡單的行善去惡的發展。總之，異說紛紜，競相向感到困惑迷惘的人招手；知識份子和老百姓在黑暗的政治和開始波動的社會氣氛中，也熱切地尋覓生老病死等大問題的答案。

結語

在此時刻，利瑪竇等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了中國。他們遵照葡王「護教」的規定，乘搭葡國的船，途經葡國的殖民地，來到中國，但却沒有沾染帝國主義的氣燄；在個人好惡和傳教方針上，都盡力遠離佛朗機的惡譽。他們本着「文藝復興」的耶穌會教育，體會到中國文化的優越之處，也看到中國文化用得着他們貢獻的地方。他們持着公教改革的熱忱和耶穌會靈修的涵養，以真誠和中國士大夫交接。於是，他們以天文、地理、幾何、機械為啓門之鑰，以「適應儒家」為傳教的方針，嘗試在尋尋覓覓的晚明社會中，傳揚他們的信仰；遂打開了近代中西交通史和中國教會史的第一段。